

新史学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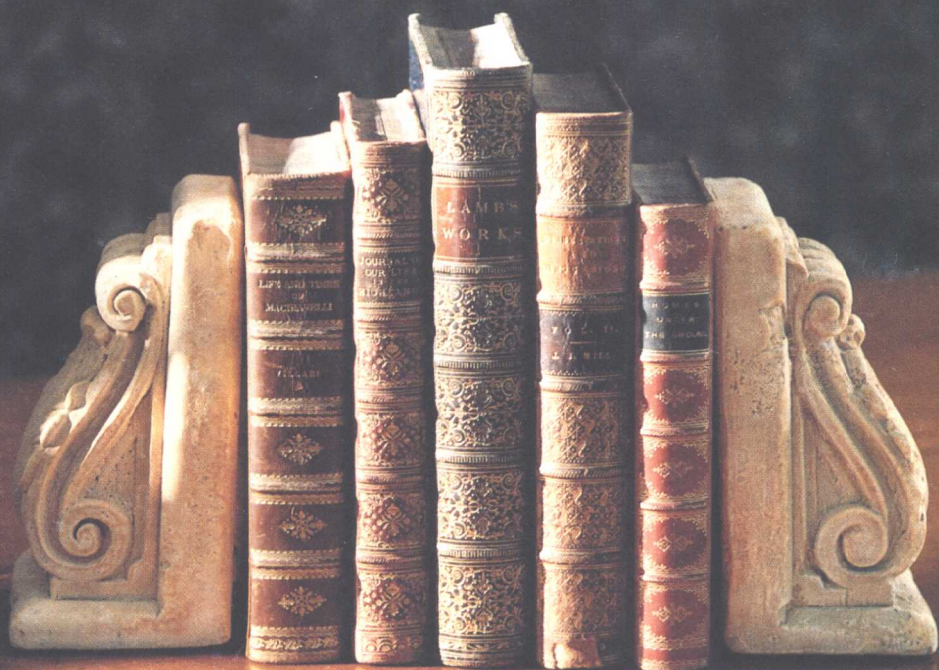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伊格尔斯 著

何兆武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 史 学 译 丛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伊格尔斯 著

何兆武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 (美) 伊格尔斯著; 何兆武译.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1

(新史学译丛)

ISBN 7-5382-6482-5

I. 二… II. ①伊… ②何… III. 史学-研究 IV.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5165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95 千字 印张: 9³/₄ 插页: 1

印数: 1—3 000 册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丽君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封面设计: 吴光前

定价: 19.00 元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 1926—)是当今美国著名的思想史家和史学史家,原籍德国,1951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曾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78年起任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欧洲思想史荣誉教授至今。半个世纪以来,他曾有专著多种和论文多篇问世,且有不少已译为中文。1962年中文即已译有他的《美国与德国历史学中的兰克形象》一文(载《历史译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期)。1989年他的《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和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陈海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两书中译本出版。另外,他的《德国的史学观——从赫德尔到当今史学思想史中的民族传统》虽尚未见中译本,但已在西方史学界享誉颇隆。

1993年伊格尔斯曾以德文写了《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一书,在德国哥廷根出版,经张芝联先生推荐,已译为中文出版(《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2期,1996年第1—2期连载)。1997年他又用英文写了一部《二十世纪的历史

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由美国威斯理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自序此书说：“这个英文本并不是德文本的译文，在许多方面它都是另一部著作，是过去三年之中我对德文本进行补充、阅读和讨论以及保持批判的距离所获得的结论。”

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陈启能兄邀我和他共同译此书，以供我国史学界同人的阅读和参考。在我动笔之后，陈启能兄以工作繁忙不克分身，遂将全书译事委诸我一人承乏。现值全书译竣之际，我要感谢他对本书翻译从始至终的关注和帮助以及与出版社的联系。原作者的前一部书《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也是由陈启能兄全权进行组织工作的，我所承担的只是具体业务工作。

原书中所引的参考文献甚多，有一些未能一一找到原文的，只好就字面加以理解；如有错误，尚乞读者加以指正，拜嘉无极。

译者谨识

1999年春于北京 清华园

又：兰克在近代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似可方之于牛顿在近代西方科学史上的地位；到了二十世纪两人绝对权威的地位均告动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主持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路数，其意即在师兰克的故智。当时胡适、傅斯年一辈人以为历史学就是史料考据，故有“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格言。殊不知证据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说话的不是证据，而是号称掌握了证据的人。而且“史料即史学”的说法，也是对兰克及其学派的严重误解。兰克及其学派虽然以资料博洽、考据精赅著称，然而他们进行研究的指导思想却是他们内心深处

那种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不首先深入考察指导他们思想的世界观,则对兰克及其学派的理解仍不免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为了理解二十世纪史学思想的十九世纪背景,现将同一作者的《美国 and 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一文附录于书后,以供关心现代西方史学读者们的参考。

译者附识

中文版序言

我非常高兴,本书在人民共和国即将以中文出版。我非常欣赏中国对我的著作感兴趣。我最初的文章之一《美国和德国思想中的兰克形象》在 1962 年就已经有了中文译文,后来我得知它的翻译者就是本书的翻译者何兆武先生。后来我的《欧洲史学的新方向》(1975)和我与哈罗德·T·派克合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1979)两书,均于 1989 年在北京出版。多年来我和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有着密切的学术接触,自从 1980 年“历史学的历史与理论”创建以来他一直是该国际委员会的一个活跃的成員,也曾是我在布法罗城的客人。齐世荣教授在 1982 年有六个月作为我系布法罗城的访问教授,也是我的同事。反过来,我的妻子和我在 1984 年也有六个半星期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作他的客人,当时我还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京大学作过讲演。我在布法罗城有过几个中国学生:王晴佳成了我的好友,我和他在有关比较历史学的题目上一直密切合作;邵立新来自北京,他为我写过一篇关于中国接受尼采的论文;还有周桂楷来自台中,他写过美国劳工历史学。我对于中

国历史学家的著作日愈感到兴趣,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尽管不幸的是我不能阅读中文而必须依靠翻译。过去五年内,我积极参与了一项《中国文学与比较史学》的国际项目,我期待着在2001年夏季再次访问中国,届时我希望能讨论此书的题材,并且也能学习到我所考察的当代欧洲和北美的历史学思想和著作曾经是怎样引用于中国的问题。

本书所探讨的关键问题是后现代主义向严谨的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本书是1990年我在费城关于《合理性与历史》这个题目所做的一次讲话的扩充。另外两位小组讨论发言人迈克尔·穆莱(Michael Murray)和列泽克·柯拉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都认为从事合理性的探讨以及客观性,乃是属于已告结束的那个近代时期的一种幻觉。穆莱从一种海德格尔式的立场出发,宣称启蒙运动的事业及其对于某一种主义的真实性的信念——它是可以被理解的,并且在某种限度之内是被人类的智慧所塑造的,为人间的和人道的目的而服务的,——已经破产了。柯拉可夫斯基在波兰开始他的思想工作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也抱有这种幻灭感;但是他力争以回归到宗教性——它先行于并且继续着自从希腊的古代以来就塑造了西方思想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来对一个已经丧失了一切幻念的时代重新建立稳定性和意义。我在我的讲话里是维护一种经过了提炼的启蒙运动。我承认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提奥多·阿多尔诺(Theodor Adorno)所称之为的“启蒙运动的辩证法”,那在企图克服神话和野蛮主义时,却培养出了新的神话和一种在科学上是十分完美的野蛮主义。然而同时我也在维护为着一个适宜于生活的文明世界所必须的那种人

道与理性的因素。

这本小书是我在费城所作的那次讲话中的思想的发挥。我想要考察,近来的各种讨论曾经怎样地在实际上影响了实践的历史学家们的工作。因而本书就取代了我早先在《欧洲史学的新方向》一书中对二十世纪史学思想和著作的论述。但它并不只是对前书的修订和补充而已。在过去的二十五年来,在历史研究中发生了很多的事。前书对于近代历史学的讨论截止于二十世纪 70 年代的初期,当时对历史学作为基于经验的与分析的社会科学之上的一门高度技术化的学术的可能性,具有着很大的信心。“年鉴派”历史学家们、计量史学家们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沿着同一个方向在行动,尽管他们的社会政治观点不同。他们大家都以自己已经克服了自从兰克以来史学家们把叙事的焦点集中在左右了历史学的伟大事件、人物和思想上的那种狭隘的局限性而感到自豪。然而随着增加的问题变得日愈明显和自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所依靠的那些乐观的假设受到了挑战,他们对科学、进步和现代性的信仰从二十世纪的 60 年代以后已经极大地动摇了。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在历史编纂学的方法上,它从精英们的身上转移到居民中的其他部分,从巨大的非个人的结构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各种现实的方面,从宏观历史转移到微现历史、从社会史转移到文化史。对冲突的看法也不相同了,它从一种更为非个人的层次出发,而不再像它以前的兰克的势力均衡或马克思的阶级冲突那样宏伟的概念了。性关系与性能力,成为历史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所有这些都包含着新的研究战略,它更少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更多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因此本书就必须从以前那部

书已告中止的地方入手。但是对新趋势的考察也需要格外关注并批判晚近的历史学所依赖的理论前提。比起一份概述来,本书更其是一篇展开来的论文,它比前一部书更加有意识地提出一种对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易于接受的、而同时又是批判的观点。后现代的思想家们从罗兰·巴尔特(Rolaud Barthes)到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关于科学合理性的界限以及高度评价科学与合理性的地方文明的性质,都曾提出过许多重要的问题。然而他们不再看到历史学与想像的文学之间有区别的那种极端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却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在过去的三十年之中已经探索了新的地带和新的战略;他们已经改变了要献身于严谨的研究来如实地重建历史的过去。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其意义并不在于历史学的研究而在于更加精深的辩论。

本书的最初德文本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20 Jahrhundert* [《20 世纪的历史学》] 于 1993 年出版,中文翻译为一系列的论文刊登于《史学理论研究》上。目前这部书,出版于四年以后;它不是德文本的译本,而是重新改写过并增补过的。

最后,我谨表示我对张芝联教授、王晴佳教授、陈启能教授和译者何兆武先生使得本书能达到中国读者之前的特别感谢之忧。

格奥尔格 G·伊格尔斯

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城

1999 年 11 月

序言与致谢

本书的德文本出版于1993年,同时已被译为中文^①、日文和西班牙文。德文本是以1990年四月我在“费城哲学讨论会”(Philadelphia Philosophy Consortium)上所发表的论《合理性与历史》一文为基础的,文中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挑战的问题。目前这个英文本并不是德文本的译文,在许多方面都是另一部著作,它是过去三年间我对德文本加以补充阅读和讨论以及保持批判的距离所获得的结论。

有两点声明:尽管本书试图要对国际范围上的历史思想作一番比较考察,但它只限于我所能阅读的语种。因此焦点就聚在大不列颠和北美、法国和比利时、德语中欧和意大利,偶尔也提到波兰和俄国著作的译本。然而哪怕就在这些地区,我挑出来的作者们也必定是高度有选择性的,焦点主要是集中在那些可以阐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趋势的历史学家们的身上。

^① 中译文《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连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2、3、4期,1996年第1、2期。——译注

我要感激过去六年中间那些允许我得以检验我的论点并对较早的原稿本进行过评论的学生们和同事们。我特别感谢莱比锡大学我的讨论班上的成员们,他们在1992年夏季我任客座的学期时阅读过并评论过德文手稿的初稿;感谢在大西洋两岸的和日本的许多同事们和朋友们,他们也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批评性的建议,其中包括 Werner Berthold, Gerald Diesener, Christoph Dipper, Wolfgang Ernst, Dagmar Friedrich, Akira Hayashima, Wolfgang Hardtwig, Frank Klaas, Wolfgang Küttler, Jonathan Knudsen, Iris Pilling, Lutz Raphael, Anne-Katrin Richter, Hans Schleier, Ulrich Schneckener, Fernando Sánchez Warcos, Christian Simon, B. Sträth, Rudolf von Thaddeu, Wiebke von Thadden, Edoardo Tortarolo, Johan van der Zande 和 Peter Waltner。我要感谢 Ottavia Niccoli 有关晚近意大利社会文化史的有用的提示。我发现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历史研究所是一个惬意的和富于启发性的地方,可以写出我大部分的德文稿和英文稿。这个研究所不但提供我使用一座优良的图书馆,而且还有机会和阅读过本书全部或大部分的学者们讨论本书,包括 Hans-Erich Bödeker, Alf Lüdtke, Otto Geshard Oexle, Jürgen Schlumbohm 和 Rudolf Vierhaus 在内。Jörn Rüsen 邀请我出席过的“贝勒费尔德(Bielefeld)跨学科研究中心”的许多次讨论会,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在德国方面, Uandenhoeck & Ruprecht 出版社的 Winfried Hellmann 是一位出色的编辑,他在德文本出版之前和我反复晤谈并提出了犀利的批评。我非常感谢柏克(Peter Burke),他在一段短文里读到了英文手稿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我已经采用了;我也感谢马克斯·普朗克

研究所的 Albert Cremer 和 Stephen Kaudelka 以及 Mission Historique Française en Allemagne[法国史学访德代表团]的 Patrice Veit,他们阅读了英文本的《年鉴派》一章。我要感谢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 Karl Sieuerling 在计算机方面的协助。州立大学 Lockwood 图书馆的 Charles Daniello 经常提供我目录学方面的信息。我要感谢我在水牛城(Buffalo)的助手 Song-ho Ha 向我提供了出色的文秘与学术方面的帮助。水牛城纽约州立大学应允安排我的教学计划,使我有了最大限度的时间从事我的研究和写作。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中心为一个更大的项目提供了资助,本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洪堡基金(Humboldt Foundation)提供我两次在德国的半年生活费。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 Wilma,她细心地阅读了德文和英文两种文本的体裁上和逻辑上的一贯性,并做出过一份英译的草稿。

格·G·伊格尔斯

哥廷根,1996 年 5 月

目 录

译者前言

中文版序言

序言与致谢

绪论	1
I. 早期阶段:历史学作为一种专业规范的诞生	23
第一章 作为历史学研究典型的古典历史主义	25
第二章 古典历史主义的危机	35
第三章 德国的经济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的滥觞	41
第四章 社会史学的美国传统	47
II. 中期阶段:社会科学的挑战	55
第五章 法国:年鉴派	57
第六章 批判理论与社会史:联邦德国的“历史社会科学”	74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批判	

的人类学	89
Ⅲ. 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109
第八章 劳伦斯·斯通与“叙述史学的复兴”	111
第九章 从宏观的到微观的历史学:日常生活史	116
第十章 “转向语言学”:历史学之作为一种学术的终结?	136
第十一章 20 世纪 90 年代的视角	154
结束语	162
注释	170
推荐阅读书目	219
索引	223
附录 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	238

绪 论

二十多年前我出版了一本有关当时欧洲历史学研究状况的小书,书中我说明了学术研究的传统形式是怎样地被更新颖的历史研究形式所取而代之的。^①所有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大抵都同意,自从十九世纪初期国际上就开始作为一种专业规范在运用着的那种历史研究方式,已经是既不符合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政治状况,也不符合现代科学的要求了。同时,有关历史的和历史学的观念,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本书不应该看做是一部续编,即——可以说是——要把我 1975 年的著作写到今天。反之,它主要地是涉及从当今历史学家们思想中和实践中所挑选出来的某些基本变化。尽管有许多旧式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形式还在继续着,然而已经发生了一场基本的重新定向。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自从十九世纪以历史学作为一种专门学术的出场为其基础的那种历史学的研究与写作的种种假设,就日愈受到了人们的质疑。有许多这类假设都要追溯到西方历史学从古典古代一直延续下来的那个传统的开端。十九世纪的